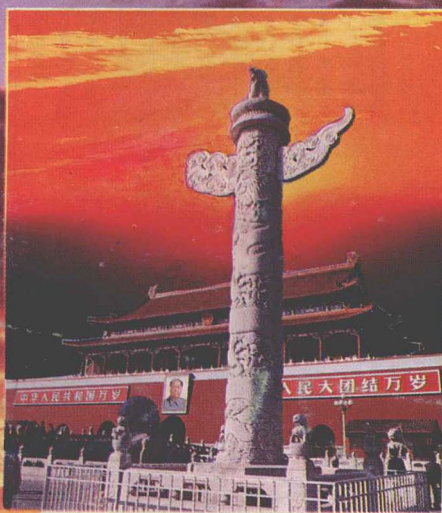


“中华魂”华夏名人传记系列

施国 海童 总主编

爱国民族英雄丛书

左宗棠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“中华魂”华夏名人传记系列·爱国、民族英雄丛书

左宗棠

国家教委图工委装备用书

“中华魂”华夏名人传记系列·爱国、民族英雄丛书(18册)

编 著/李春秋 主编

责任编辑/黄祖民

封面设计/程全盛

责任校对/黄祖民

印 刷/北京市怀柔中科印刷厂

开 本/787×960毫米 1/32 印张/65.375 字数/1127千

版 次/1996年4月第1版 1996年4月第1次印刷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北京朝阳区西坝河

邮政编码:100028

东里77号底商5号

ISBN7-80120-083-7/K·10

全套定价(18册):64.00元

“中华魂”华夏名人传记系列

总 主 编

施 国 海 童

分卷主编

政 治 家	丛 书:	田 清	方 克
思 想 家	丛 书:	樊美筠	海 童
文 学 家	丛 书:	海 童	橡 子
科 学 家	丛 书:	杜升云	
艺 术 家	丛 书:	李建盛	
改 革 家	丛 书:	李春秋	钟显林
爱国、民族英雄	丛 书:	李春秋	

“中华魂”华夏名人传记系列总序

施 国 海 童

伟人，不是那种不识人间烟火，一身清白、毫无瑕疵的神仙菩萨；也不是玩弄权计、乱纲乱朝的贼臣逆子；更不是那种将个人意志凌架于民族、国家利益之上，拿人民的前途赌个人命运的战争狂客。真正的伟人，是在民族兴衰、国家存亡的生死关头，不计个人得失，敢于挺身而出，用自己的热血与智慧，挽狂澜于即倒、救生灵于涂炭、昭真理于天下、抵外侮于国门的铮铮铁汉；是在和平的年代辛勤耕耘，丰富与发展了民族的思想、文化、艺术、科技、经济……促进了民族繁荣与进步的伟岸丈夫！如果说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，那么，伟人更是集合了全民族的智慧与力量，在民族迷惘、国家黑暗的年头，昭示了历史前进方向的指路明灯，是最能代表全民族大多数人民的智慧、利益的大圣大哲！是他

们构成了一个国家与民族渊源流长的精神纽带。

中华民族是有着五千年灿烂文化与历史的伟大民族，在她璀璨无双的历史长河中，孕育了一代又一代“力拔山兮气盖世”的圣哲贤人。很难设想：假如我们没有一代圣儒孔子、孟子？！没有一代圣明君主汉武帝、唐太宗？！没有秉笔直书历史的巨擘司马迁、司马光？！没有皓首穷经致力于科学研究的科学巨人张衡、祖冲之？！没有杀身成仁、泽福后世的改革大师商鞅、王安石？！没有抵御外侮虽九死亦不悔其志的爱国、民族英雄岳飞、林则徐？！……中华民族会是什么一种样子！正是由于拥有了他们，我们才敢说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、英雄的，我们的历史是完整的、辉煌的。

大浪淘沙，历经风霜而不凋、历经岁月而难泯的仁人志士，是中华民族最生命最可宝贵的财富，是中华民族“魂”。他们的精神就像朝夕相伴我们的阳光、雨水、空气、粮食，早已渗入到炎黄子孙的血液，与我们共同分担着民族的兴衰荣辱。

历史是今天的镜子。

沧海桑田，斗转星移。今天，当新的机遇、新的挑战向我们展示了中华民族最辉煌前景之际，如何让年轻一代的中华儿女尤其是广大中小學生免遭腐蚀侵害，健康茁壮地成长，是时代赋予我们最严峻的课题。因此，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、李岚清等多次谈到了

如何整理、挖掘古代文化遗产，弘扬传统文化，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指示与精神。正是基于此，我们编纂了大型丛书《“中华魂”华夏名人传记系列》，它包括“政治家丛书”、“思想家丛书”、“文学家丛书”、“科学家丛书”、“艺术家丛书”、“改革家丛书”、“爱国、民族英雄丛书”等七个类别，计 125 余本，分别介绍了 125 余名中国古今名人，是迄今为止，我国最大的一套关于华夏名人的传记丛书巨著。丛书主要以广大中小学生为读者对象，用通俗、浅显的语言，重点讲述了华夏名人们如何发奋图强、报效祖国的成才故事，以及他们的精神内核及其对中华民族的影响，具有较强的文学性与思想性，是对广大中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教材。

最后，尤其需要提出感谢的是：北京师范大学、北京大学、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参加撰稿的专家、学者们，在如此短的时间里，较高质量地完成了本丛书的全部创作任务，其严谨、认真的写作态度，为本丛书的出版增添了不少亮色。

1995. 10

目 录

一	身无半亩	心忧天下.....	(1)
二	楚军起家	坐镇东南	(11)
三	师夷长技	兴办洋务	(23)
四	平定捻回	挥师陕甘	(35)
五	筹我塞防	哪怕万难	(50)
六	周密部署	全歼顽敌	(66)
七	抬棺以行	收回伊犁	(81)
八	新疆建省	恢复生产	(92)
九	抗击法军	重返福建.....	(104)
十	回天无力	撒手尘寰.....	(114)

一 身无半亩 心忧天下

清仁宗嘉庆十七年十月初七日（即 1812 年 11 月 10 日），左宗棠出生于湖南省湘阴东乡左家墩。据传说，在他出生的那天晚上，有一位年近 80 的老妇人，梦见一个天神从空中降落到左家院子里，当惊醒后，听见左家传出了婴儿的啼哭声……

左宗棠，字季高，家里儿子中排行第三，另外他还有两个姐姐。他父母生他时都已三十七八岁。在家中由于左宗棠诚信正直而且非常孝顺，所以深得祖父母、父母的喜爱。

左宗棠四岁时，跟着祖父上山游玩，一路上不断地向祖父提着各种各样的问题。看见起伏翠绿的山岭上生长着许多栗子树，栗子树下散落着许多果子，他蹲下拾了好多，并让祖父也帮他捡。回到家他把栗子均匀分成四等份，给了姐姐和哥哥，他自己却没要。祖父看在眼里喜在心上，不住地赞叹：“好孩子呀，将来肯定有出息，从小就不贪心，不自私，分东西还均匀。”

左宗棠非常尊重老人，这尤其体现在对他卧病在床多年的祖父的态度上。左的祖父由于年老多病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，起居必须有人服侍，宗棠毫无怨言地担当起此重任。每天除了在身旁照顾外，还要到河边洗祖父大小便失禁换下的衣服。

尽管左家属于书香门第，但日子却过得非常清苦，因为他家的几十亩地不可能养活包括祖父在内的两个五口之家。作为秀才的祖父和父亲只好一面耕种，一面教书，来挣些钱作为养家糊口的补贴。

宗棠生活在这样一个耕读之家，自然受到了极其严格的儒学训练。他3岁学识字，4岁读《论语》和《孟子》，9岁开始学做八股文章。由于他祖父、父亲教育孩子既循循善诱，又严格管教，所以，左宗棠的文化知识基本功非常扎实，毛笔字也写得挺拔秀丽。

嘉庆、道光年间，政治腐败，贿赂成风，人们非常熟悉地一句话就叫做“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”。地痞官僚鱼肉乡里，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。左宗棠的父亲辛苦地劳作、教书，但家庭生活仍每况愈下，入不敷出，又加上姐姐婚嫁，祖父母、长兄先后亡故，家境就更加贫寒了。左宗棠就是在这样的家境下逐渐成长起来。左宗棠曾回忆，家里雇不起乳母，母亲又奶水不足，只好嚼米成汁来喂他。对母亲这是一件苦差使，而孩子却还吃不饱，只是哭，把肚脐眼哭得突出来，以至年老发胖，

“腹大而脐不深”。

宗棠的父母相继过世，家中只剩下他和二哥左宗植，生活异常艰难。1831年，左宗植谋食他乡，宗棠深感身世悲凉，作诗寄赠宗植：“一家尽死丧，君我先人遗。念兹并百忧，泣涕以涟汤。……故山有黄精，野间多蕨薇。何为早归来，与君共锄耕”。

由于生活的拮据，1832年21岁的左宗棠入赘到周家当了女婿，其妻周诒端，通情达理，又能写诗作赋。可不管怎样说，在封建社会除非走投无路，一般人们是不会做赘婿的，因为那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情。

尽管左宗棠潦倒落魄，但他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，一天也没有忘记通过科举考试改变自己的地位。1826年（清道光六年），左宗棠第一次参加了湖南湘阴令主持的童子试。第二年，参加了长沙知府主持的府试，都取得了好成绩。可是由于他母亲生病，等到湖南省学政主持的院试时，没有能参加，故未取得秀才资格。这对他打击不小，但也正是从此他开始把兴趣转移到“经世致用”这方面。

所谓“经世致用”之学，就是反对读书人读死书、死读书，反对脱离现实的繁琐考证，倡导学术研究更好地为社会现实服务。大概和现在的理论联系实际有些相似。18岁那年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买到了顾祖禹的《读史方輿纪要》和顾炎武的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。左宗棠如获

至宝，废寝忘食地研究书中的内容，他从中发现了一个与八股文截然不同的知识世界。他在评论《方輿纪要》一书时说：“所载山川险要，战守机宜，了如指掌。”

左宗棠如此读书，对于当时正统的知识分子来说，已经意味着有些“离经叛道”，为世俗所不耻。与他一起读书的学子们明讽暗讥，甚至有人还捉弄他。可是左宗棠不为所动，依然我行我素。他除了读书，还自己绘制地图。他计划先绘全国地图，然后再绘分区图等。当后来他做到陕甘总督时，有位俄罗斯人叫索思诺福齐，去访问他，带了一张《康熙輿图》，自吹对中国地理非常熟悉。左宗棠却拿出《乾隆輿图》来，向他考问了一番，问得他瞠目结舌。这位自以为中国通的外国人，从此再也不敢在左宗棠面前吹牛了。当然这是后话，不过左宗棠在当时却为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

他没考上秀才，又没别的办法，只好在20岁时花钱买了个监生，获得了继续参加举人考试的资格。在1832年的乡试中，他的考卷本来已遭否决，可又阴差阳错被主考官“搜遗”而出，幸运地成为湖南第18名举人。考中举人后，左宗棠以为幸运之神开始垂青自己，眼中又浮现出状元、进士的希望，信心十足地准备第二年的会试。从湖南到北京迢迢万里，费用非常大，他妻子深明大义，用陪嫁的钱资助左远行。这时却赶上他大姐家穷得揭不开锅，左宗棠把二百两银子悉数送给大姐，后来

幸亏亲戚们凑了一百两银子给他，使其得以成行。但结果却是名落孙山。书中的黄金屋没有了。以后，左宗棠仍不甘心，于1835、1838年又两次去北京参加会试，都失败了。此时的左宗棠心灰意冷，认定由科举考试为官的路被堵死了。他决心不再向科举制度讨前程。

祸兮福所生。科场失意使得左宗棠更加坚定了研究“经世致用”的学问。如果当时左宗棠沿着科举制爬上去，也许会成为一个刀笔吏而恶霸一方，也许会成为小有实力的清官，但无论如何造就不了一个统兵数十万的封疆大吏，更不会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著明的爱国者。他用自己准备好的头脑经受住了机遇的考验。

左宗棠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到“经世致用”之学上。他用功研读《皇朝经世文编》，并有幸见到了该书作者贺长龄。贺认为左宗棠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而推荐到长沙南城书院读书，用朱程理学来丰富经世致用的知识。书院山长贺熙龄（贺长龄之弟）对左宗棠非常赏识，曾作诗夸奖他“开口能谈天下事，读书先得古人心”。在城南书院，左宗棠还结识了一些有志于经世致用之学的同学，他们当中有些人成为湘军重要创始人。

1838年左宗棠第三次会试失败，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事业上的失败者，开始集中精力研究舆地，绘制地图。他们夫妻搭档，左宗棠绘图，周诒端为他影绘，整整画了一年。夫唱妇随的学术生活，不急功近利的怡然心情，

从一定程度上医治了左宗棠的心灵创伤，又燃起了那股从未熄灭过的报国之志，它像钢炉里的火焰，虽然沉稳，但温度极高。当时，他写了副对联，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：“身无半亩，心忧天下；读破万卷，神交古人”。左宗棠对地学的潜心研究，为他以后的戎马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因为熟知地理，对一位统帅是至关重要的。

左宗棠的思想越来越具有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的特点，他特别关心祖国和人民的命运。在当时，左宗棠就已经充分认识到农学在中国这个农业大国的作用。他利用在安化两江总督陶澍家任家庭教师的机会，8年时间里读遍了历代讲农事的著作，并分门别类抄起来，计划编成一部《朴存阁农书》。他还在自己家里搞试验，种桑、养蚕，并开湘阴之先河，试种茶成功。他对此非常自豪，自称“湘上农人”。左宗棠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写道：“兄东作甚忙，日与佣人缘陇亩，秧苗初茁，田水琮琤，时鸟变声，草新土润，别有一番乐意。”在外人看来这大概是左宗棠的世外桃源了，然而左宗棠毕竟不是陶渊明，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要报效祖国，仅仅是为将来作准备而已。而正是由于这些阅历，在他当官以后，到处喜欢教兵士屯田，教人民耕种。

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，使左宗棠在教学耕作的生活中更加关心国家的命运。左宗棠虽然在安化教书，山区偏僻，信息不灵通，但他心系东南沿海抗敌前线。他

关心战局形势的变化，随军事斗争的胜负而喜而忧。他写信给贺熙龄，请来信多多提供战争进展情况。而且，他还勤奋阅读所能得到的各种记载有关外国情况的史志、别录，做到知己知彼。左宗棠崇拜诸葛亮，敬仰他的才华，常以诸葛孔明自居。但他并不迷信，他对自己更有信心。就在这场战争中清军应取的制敌之策，左宗棠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。在他的《上贺蔗农先生》书中，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制敌之策。左宗棠认为目前主要可虑之处在于英军船坚炮利，牵制清军兵力，敌人主动，清军被动。如欲制胜，必须打持久战。他反对“急旦夕之功”，主张采取扎实的战备措施，以此使“一省之力足当一省之用”，避免敌攻一处，全局震动，调兵征饷，疲于奔命。他还提出沿海各省应“练渔屯，设碉堡，简水卒，设水寨”，讲求应用火器，实行坚壁清野，断绝敌人的后方接济。在战术上，左宗棠认为敌人“所恃，专在火炮”，这并不可怕，因为火炮利仰攻，不利俯击；利远击，不利近攻。因此他提出清军应专守城根河岸，或设险埋伏于敌军必经之路，当敌军迫近之时火炮已无利进攻，然后伏兵突起于前，奇兵疾出于后，前后夹击，一举歼灭。魏源的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思想在左宗棠的战略战术中充分地体现出来了。左宗棠的这些军事主张与魏源、林则徐等人在鸦片战争中所提出的抵御英军的战略战术大体相同，他们的抗敌主张都属于那个时期的杰出思想。而

左宗棠又处于湖南内地，远离东南战场，能够依据实际地理状况提出这样的用兵之计，实在是难能可贵，难怪他要以诸葛孔明自称。

左宗棠时刻关注着东南战事，对战争前途，念念在心。他痛斥投降派穆彰阿、琦善之流求和卖国的行径，在敌人面前卑躬屈膝的丑恶嘴脸。他在给在京做官的友人的信中，尖锐地指出清军一败涂地的病源：“……方今时事之坏，无过上下相蒙，贤奸失别。”虽为一草莽塾师，左宗棠却如此关心国家大事，敢于在一派“海疆之事，触喉转伟”、“严有诗书偶语之禁”的高压政策下，发表自己军事上的主张，甚至是针砭朝廷的言论，足以看出他的一片拳拳爱国之情和愿为国家效力、鞠躬尽瘁的抱国之志。这正应了他自己的话“身无半亩，心忧天下”。也正是他所崇拜的诸葛亮的高风亮节。

左宗棠在痛斥投降派的同时，钦仰歌颂抵抗派，特别仰慕林则徐。左宗棠赞成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的立场和态度，同情林则徐的遭遇。而他与林则徐的一段交往又丰富了他的爱国思想，反映了他爱国思想的一个侧面。1849年冬，林则徐从云南告病辞官回原籍，路过长沙，招请左宗棠。两人相见于湘江舟中，促膝而坐，抚谈今昔，无所不及，直至东方发白，才依依别去。事后，左宗棠赞美林则徐为“天人”，此次见面，更加深了他对林则徐的敬仰。1850年得知林则徐客死广东的消息，左宗棠竟

痛哭失声，他写了一副挽联悼念林则徐，上联是“附公者不皆君子，间公者必是小人，忧国如家，二百余年遗直在。”左宗棠骂尽了对林则徐百般排挤打击陷害的投降派穆彰阿之流。真可谓爱憎分明。

在悲痛巨星陨落的同时，左宗棠不禁想到了自己的处境。自诩为诸葛的左宗棠此时已近不惑之年，却仍在师塾耕读。虽然热情满腔，经纶满腹，尤其有杰出的军事才略，却仍功不成，名未就。左宗棠虽有一腔报国之志，却没有效国之门，他不禁自问，何时才会有出头之日来报效国家！机会垂青于有准备的头脑。1851年，左宗棠终于迎来了他出山的机会，但却是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机会。

1850年，洪秀全在广西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已由星星之火，渐成燎原之势。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，以摧枯拉朽之势涤荡着旧的封建官僚机器。清政府对革命洪流束手无策，便丧心病狂地调动地主阶级的一切力量对付农民起义军。清政府改变陈规，广开才路，大力收罗能够镇压起义军的“能人志士”。左宗棠以其特有的条件，脱颖而出。作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左宗棠，当民族矛盾上升时，他坚定地投入反投降、反侵略斗争，但当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时，他的阶级本性决定了他将毫不犹豫地、顽固地站在了农民起义军的敌对方面。正是凭借镇压农民起义中的功绩，左宗棠开始了他求之多年的仕途